



写好字，做好人

□ 赵长青 口述 裴珍珍 整理

人都有梦。而我的梦，总是和书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似乎冥冥之中，一直有一种意念，一种说不出的力量，引导着我，在书法之路上执著地走下去。

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写字，小学时，老师总拿我的字给同学们做示范。那时候我不懂什么书法艺术，就因为爸爸说，字是一个人的脸面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就立下了一定要写好字、写出自己脸面的决心。

在三四年级的时候，班主任讲过一个故事，影响了我一生。大书法家王羲之当年遇到一个老奶奶在卖扇子，见半天也没人买，心生怜悯之心，就对老奶奶说，你把扇子放我这吧，我给你写几个字。王羲之便开始在扇子上题诗。老奶奶生气地说，你写了字就更卖不出去了。王羲之镇定地说，你就说这字是王羲之写的，一定有人买。结果老奶奶很快就把一篮扇子都卖掉了。这个故事让我茅塞顿开：字写好了，不但受人欢迎，还能助人为乐。我长大后也要做个王羲之那样的大书法家！

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虽然上不了课，但满街的大字报也成了我学习的工具。看看哪个字写得好，就拣个棍子在地上照着临。到了中学，我开始出黑板报、墙报，有时也写标语、对联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的笔墨生涯从那时便开始了。

中学毕业时，正好辽宁省军区来招文艺兵，我因为喜爱唱歌、写字被顺利录取。到了部队，从打字员到文书，写写画画的任务大多交给我，书法技艺大增。

我转业后到了松花江地委机关当文书，发文的单位有一百多家，只能用毛笔抄写地址。三年时间，我每天都在办公室认真地写信封，无形中练习了书法。

再后来，我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，认识了许多全国各地的著名书法家，我开始研究、临习他们的作品。一个偶然的契机，我调到中国文联，在组联部当主任，经常跟中国书法家协会打交道。记得当时我特别喜欢沈鹏先生灵动、秀逸的草书，就让人帮我求一幅字，我还出了点稿费，结果那幅字是假的。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命运最后竟把我推到书协领导的位置，让我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。

到书协工作后，我近水楼台，接触到更多书法名家，既有压力也有动力，于是学习书法的劲头更足了。

我生在农村，长在县城，工作生活在大城市，一直与书法结缘，用东北话说，这辈子挺“走字儿”。如今，我已经成为一名书法家，我知足啊！一个人，

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，一条路走对了，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就是你最大的幸福。醉心翰墨，寄情诗文，是我小时候的梦想，是我人生最大的乐事。尽管书法是一条“不归之路”，但是我一定要坚持走到底。

我觉得，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，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复兴。而文化复兴，书法是重中之重。因为书法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灵魂，是中华民族的血脉。书法艺术是依托汉字而形成的独特艺术形式，它也是中国艺术中，能够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一门艺术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过，中国的书法是艺中之艺。毕加索也说过，如果我生在中国，肯定是个书法家，而不是画家。他是抽象派画家，用笔讲究变化，无疑

吸收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元素。我步入书法艺术的神圣殿堂，并在中国书协担任领导职务，就有义务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弘扬光大，让它得到最大范围的普及和推广，吸引更多的人来写书法。“全民书法，汉墨天下”是我们的理念，“从小写好中国字，长大做好中国人”也是我们的追求。

在中国书协的不懈努力下，全国中小学恢复了书法课，圆了包括启功先生在内的很多书法大家的梦想。普及书法教育，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比如“人”字，一撇一捺，互相支撑方为人，看似简单，内涵却深。练好字不仅陶冶孩子们的情操，唤醒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热爱，还可以教会他们怎么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书法对中国

乃至全世界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。我创建了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，出版社、报社、杂志社、网站，一应俱全，就是希望在退休后做点跟书法有关的事儿。我的命运是和书法艺术连在一起的，不管多苦多难，我都要继续推动我的书法梦，打造一个中国书法产业的“航空母舰”，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扬帆远航，冲出中国，走向世界。

我前不久又去了西藏，那里得白内障的人很多，我就跟一个基金会签了个协议，每年捐赠二十万元和二十幅书法作品，为雪域高原上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。像王羲之那样，通过书法扶弱济困，创造幸福，传递快乐，也算是圆了我小时候的一桩心愿。



光影 云梯人家

春耕趣



云南省红河岸边的山区，是一片几乎没有“坝子”（即平地）的土地。勤劳的哈尼族族人一代代在或陡峭或平缓的山坡上开垦梯田，运用从山顶森林中流下的山泉灌溉种植。春来了，梯田上的春耕也充满意趣。 马列/摄

爬梯易



红河岸边的元阳老县城，很难找到一块大的平地，建筑物都在高高低低的坡地上鳞次栉比矗立，楼梯连着楼梯，上坡接着下坡。坡路上有几位妇女要去县里。背着孩子、拎着袋子，她们走路起来似乎毫不费劲。 费犒/摄

笑声朗



“小伙子别走下面啊，倒土了，绕着走。”元阳老城里背着竹篓的大姐们正在建房子。微风吹着竹林，安静的山里只听得到一些鸟鸣虫唱，以及她们爽朗的笑声。 蒋新军/摄

看台树



听说在学校附近的梯田里有表演，下午一放学，哈尼族的孩子就早早地跑到田边来了。这两位三年级的小朋友把树当成最好的专座，稳稳地看起了表演。这地方可没人跟他们抢！ 草帽车/摄

让小河复苏吧

□ 田军 口述 何悦 整理

与河流结缘已经二十余年了，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教育，但是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我们与河流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从源头上保护我们的河流。

小时候我们就生长在河边，家里用水都从河里挑。后来自来水进了千家万户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离河越来越远，终于荒唐到认为水来自自来水厂，而非来自河流，忘记了自己与河流的关系。为了找回这一历史遗存，我们一直在努力着、坚持着。

我1974年高中毕业后当了知青，后来进过工厂，当过通讯员。1986年，我进了广播电视台，从记者做到了编辑部主任。然而1994年以前，我从没想过自己的事业会与河流联结在一起。与许多人一样，那时更容易看见的建筑，而对更大的遗存，例如河流——孕育城市的母亲河，却没有清

楚的意识。

1994年我从成都广播电视台被推荐借调到当时的“1号工程”，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指挥部负责对外联络和新闻发言人，我们不止一次地告诉老百姓“工程竣工之时，就是府南河水清之日”。然而当工程临近完工，府南河也因此而“锦江春回”时，府南河里却没有水。那时我们就意识到：如果府南河只有来自上游和周边支流的一河污水，修得再好也只是豪华的臭水沟，我们给老百姓的承诺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。

看着干枯且污水横流的府南河，我们起草了另一份建议，希望能一次性地整治完成之后再用5年时间对府南河的上下游实行延伸整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政府的治理目标越来越大，从府南河扩展到沙河，又扩展到40余条城市中心的中小河流，如今更扩展到413条。然而二十年过去了，成都的水当初是劣五类，现在仍是劣五类，一年里有近半年的枯水期。

我本是一个对河流没有太多情结的人，但府南河工程唤起了我对成都的记忆，对河流的记忆。2003年，我和志同道合的一帮同事专家朋友一起，组建了公益组织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，希望能坚守让河流水清的承诺。

记得在2003年左右，成都市有关

部门曾对府南河的水质污染源有一个分析：结论是有60%来自上游的农村的面源污染。

在我下乡时，农药化肥很稀缺，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却很紧密，城市从乡村获取蔬果粮食，乡村从城市获取肥料施回土地，形成微妙的循环和平衡。现代化打破了这一平衡，如今城市里的粪肥被送到了污水处理厂，提供给乡村的是各种农药和化肥。大量的田地不再依靠农家肥，农民任由牲畜粪便、秸秆烂菜经河水冲走，多余农药化肥也经由土地渗进河里。

河流是流域，她永远无法拒绝来自上游的污染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重要。8年前我们来到了成都西边郫县的安德镇安龙村，希望恢复传统农业。我们免费为村民修建了沼气池，沼气池能够提供10个月的能源，沼液回田能变成高效的肥料。对付那些沼气无法处理的菜秆废渣，我们则请专家为他们传授堆肥的技巧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，最擅长的原本就是循环低碳农业。现在村里干干净净的，剩不下什么垃圾，而村民也不再需要买蜂窝煤、煤气罐，省水省电加上不买农药化肥，一年下来能省下1000多元钱。

把环境的责任都压到农民身上是不公平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想喝到干净

的水，都想吃到安全的蔬菜水果，那我们就让农民看到希望。我们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也在城市组织搭建绿色消费者联盟，让农民每周两次或三次把他们的蔬菜直接送到消费者那里。我们也曾把消费请到安龙村，曾有一位消费者去到村里对农民说：“我们是来感谢你们的，是你们的辛苦换来我们食品的安全。”每当想起这句话，我就觉得很温暖。

现在我们不仅鼓励农民放弃农药化肥，只用农家肥耕作，也鼓励村民减少农膜的使用。因为做生态农业就应该像治理河流一样，要想到上下游是否会因为自己伤害到其他人。

与河流结缘已经二十余年了，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我们与河流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从源头上保护我们的河流。

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如今安龙村已经成为国家级生态村，获得了国内外多方的认可，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生产“有机产品”，而是通过生态农业建设生态乡村，通过生态乡村实现河流保护。我希望能够用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唤醒人们的意识，让隐藏在城市中的许许多多的小河能够复苏，能够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撑起城市的生命力。